

· 理论研究 ·

刍议《神农本草经》三品分类法的内涵*

胡素敏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法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分类方法,初看起来也是最简单的分类方法。但结合中华文明的特征对其进行深入剖析,就能认识到这一分类方法浸润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渗透着中华文明如影随形的影响,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生命观,蕴含了治未病的预防观,体现了基于整体思维的三才观,彰显了上医治国的战略观,也承载了构建健康中国目标的深刻历史渊源和丰富的哲学内涵。

关键词:三品分类法;中药分类;神农本草经;内涵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22.08.007

中图分类号:R281.2

Connotation of *San Pin* Classification Method in *Shen Nong Ben Cao Jing**

HU Sumin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San Pin* classification method recorded in *Shen Nong Ben Cao Jing* (*Shennong's Classic on Materia Medica*) is the earliest existing classification method for TCM Materia Medica, and it seems to be the simplest classification method at the first sight. If we deeply analyze the classification in ligh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owever, we can realize that this classification method is formed under strong influ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us reflecting the unique way of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San Pin* classification method highlights people-oriented view of life, contains the preventive view of treating diseases, embodies the three-element concept based on holistic thinking, and demonstrates the strategic view of "a supreme doctor even has the wisdom to govern a country". It also carries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origin and rich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building a healthy China.

Keywords: *San Pin* classification method;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Shennong's Classic on Materia Medica*; connota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 HU Sumin, Ph.D.,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o. 11, Beisanhuan Donglu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9. E-mail: husm@bucm.edu.cn

Funding: Specially Entrusted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14@ZH001), Undergraduate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Project of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in 2020

Conflicts of interest: None

胡素敏,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药基本理论及临床应用研究、辐射损伤的中医药防护研究, E-mail: husm@bucm.edu.cn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No. 14@ZH001),2020年北京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批“本科教学改革创新项目”(No. JGCX-2-2020-004),2018年北京中医药大学课程思政建设专项(No. 1310051310061),2022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揭榜挂帅”教改创新项目

分类是人类为自己生存的世界建立秩序的第一步,是认识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比较出显著特征的重要手段。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合理的分类有重大的科学价值。所谓“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素问·六节藏象论篇》)^{[1]16}，“万物并至,不可胜量”(《素问·宝命全形论篇》)^{[1]42}。通过分类,我们可以认识、揭示事物内部各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即“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2]2},而内在联系就是科学的“规律”“原理”。分类方法,取决于人类对客观事物、对自然和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从先秦时期的许多文献可知,远古时期中国地域的生物种类异常丰富,因此,中药来源也非常复杂且品种繁多。为便于人们认识和区分药物,进而更好地对中药进行检索、研究和运用,历代医家采用了多种分类方法,中药分类也成为中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中药分类的历史演化进程,可以看出,随着历代医家对中药的认识和研究的深入,中药分类方法不断发展,中药分类不断细化、深化,主次分明^[3]。而这一进程中的每种分类方法,尤其是《神农本草经》(以下简称《本经》)的三品分类法,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渗透着中华文明的如影随形的影响,也随之呈现着中华民族的智慧。

1 中药分类的起源

中国古代先民思维的起点与人类思维的起点一致,即起始于实践和观察^{[4]29,34}。西汉《淮南子·修务训》形象生动地记述了古人的生产实践和医疗实践:“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蠃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瘠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5]331}这里的“尝”,不单纯指味觉,还应包括视、听、触、嗅觉在内的多种观察、体验和感受。由此可知,先民在大量的、反复的实践和观察基础上得出经验总结并进行原始的简单分类,即“辟”和“就”。还可以看出,即便是这样原始的简单分类,仍然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分类思维受到古代中国生产实践的影响:古代中国的生产实践以农业为主,而农业生产与自然条件关系密切,即农业对自然的依赖性极强。随着农业生产实践的不断深入并最终完善,天人关系的思想也得到了清晰的表达^{[4]37-38}。

远古时期中国的自然条件优越,生物种类丰富,非常有利于原始人的广泛的采集活动。在采集活动中,一代又一代的原始人不断重复着对生存资料的

观察,其记忆与传说成为远古时期先民知识的直接遗存,被保留在先秦时期的一些著作中,《山海经·南山经》:“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馀,食之不饥。”^{[6]1}有人将“祝馀”释为今之百合科沿阶草属麦冬^[7];《山海经·中山经》云:“有草焉,其状如蕞,而方茎、黄华、赤实,其本如藁本,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6]159}“荀草”属于蔷薇科的落叶灌木;《山海经·西山经》中记载:“有木焉,其状如棠而员叶赤实,实大如木瓜,名曰櫬木,食之多力。”^{[6]79}“櫬木”属于豆科的落叶乔木。从这些简单却准确的分类、直观且生动的描述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古人全面而细致的观察。这些对客观事物的观察,是人类思维或意识的最早来源,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开始,就是具体事物之“象”^[8]。

《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9]346}“仰观俯察”和“观象”是以感官的直接感受认识事物的形象以及物象,这种思维方式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前提,即直观思维或象形思维。古人通过直观思维或象形思维对多样、复杂的世界有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后,沿“辨物”的方向开掘出识别和区分能力,确定事物性质。再进一步深入发展,对事物形态作十分细致的分辨,寻找具体事物之间的异同,然后向分类逐步过渡。

最早、最准确、至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的分类,当首推《易经》^[10]。分类思想在《周易》本经中就有了萌芽,卦象分为八纯卦和六十四别卦,卦下系之不同的卦爻辞,分别有吉凶休咎之分,卦爻象与卦爻辞各有自己的功能和属性,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界限,各自归为一类。易传对经的解释,继承了经的分类思想,并把分类思想具体化,更重要的是把这种思维方式总结概括出来,即“类族辨物”,如《周易·同人》所言:“《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9]73}“类族者,于其族而类之;辨物者,于其物而辨之。”^[11]即言异中求同,同中求异;《周易·系辞上传》亦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9]315}这些都反映了古人求同别异、求小同存大异的认识方法和逻辑思想。而《尔雅》第一次明确地将植物分为草本和木本两大类,与现代分类学的认识基本一致。如《尔雅·释草》中的一百多种植物,均为草本植物;《尔雅·释木》中几十种植物,都是木本植物;《尔雅·

释草》将山韭、山葱、藿、山薤、山蒜等排列在一起,属葱蒜类,与现在分类学的葱蒜属相当^[12]。

2 《神农本草经》三品分类法的深刻内涵

如果说先秦时期非医药学著作中有关药物的记述和分类,还处于原始、简单、粗糙和零散的状态,那么,经过漫长的、不断重复的实践与观察,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试错与纠错,以及对药学知识的积累与梳理,到了秦汉时期,在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药物分类体系已臻于系统和完备。

2.1 《本经》三品分类法

基于临床药理学药物分类的关键——主要功效(扶正与祛邪)和药性(有毒与无毒),《本经》按照药物的补虚祛邪和有毒无毒等作用特点,将所收录的365种药物分为上药、中药和下药3类,后世将其称为三品分类。其《序录》开篇即云:“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13]

初看起来,《本经》三品分类法的依据——药物补虚祛邪的功效及有毒无毒的药性,来源于先民长期、反复、大量的实践与观察。所以有人认为“这是我国中药学最早且又最简单的分类方法”^[14]。但古人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经验,进而根据“无毒”“有毒”,推断应该“多服久服”,还是“斟酌其宜”或“不可久服”。这点更直接地反映出:古人已经凭借最初的直观思维或观象思维,清楚地意识到现象对于了解事物本质或规律的意义,由此在观察现象与把握规律之间建立起自觉的联系,进而发展为归纳总结及推理分析的逻辑思维。如果再深入分析这一分类系统,便可知三品分类法并不是单纯的简单分类,其蕴含的思想完整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镌刻了优秀而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也为身处当代的我们提供了“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思路和方案。

2.2 重人贵人,突出以人为本的生命观

《本经》三品分类法中,药物的功效和有毒无毒,是药物作用于人体之后得出的反应,这体现了人与药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更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生命观。

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即人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

朝,曰:‘伤人乎?’不问马。”^[15]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人的生命的关爱程度,珍惜生命、关爱生命是儒家生命观中的基本态度。《荀子·王制》对人的基本描述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2]98},荀子认为,人走不如马、力不如牛,却是天地间最为贵重的。与儒家“重人”“贵人”思想一样,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现存成书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也重视人。《素问·宝命全形论篇》云:“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1]42}《灵枢经·玉版》云:“且夫人也,天地之镇也。”^[16]这是说天地之间,万物之中,人是最宝贵的、最主要的,离开了人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首要的是重视人的生命,保全人的生命和健康。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7],人的个体生命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前提和最终的归宿。

《本经》的三品分类方法:“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多毒,不可久服。”即是在人与药物的关系中,凸显以人的生命、人的健康为根本,来区分药物的种类。这种突出以人为本的生命观的分类方法,即便在今天看来,都是站在哲学高度的一种简单却不失高级的分类方法。

2.3 养命养性,蕴含治未病的预防观

《本经》的三品分类法还蕴含着治未病的预防医学观。治未病理念在中华民族早期的生存实践中即已显现,经过历代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和优势的中医预防医学思想的指导体系。原始先民为保证生存,维护健康,人工构筑居住场所,如《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18]为了提高生存质量,逐渐用火改善饮食、卫生条件,如“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19]这些蕴含于原始人类生活实践中的养生防病行为,在当时尽管只是一种潜意识的保全意识,但也反映了早期先民已经朦胧认识到疾病预防的重要性。

在《周易·既济》中有“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的论述^{[9]307},明确提出居安思危的预防思想,这是“预防”经典名词的最早出处。《道德经·六十四章》也指出:“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20]受这种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思想的影响,《黄帝内经》在疾病的防治原则及具体治法中明确提出了治未病理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1]4}自此治未病理论成为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未病先防的预防理念对后世影响极大。如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诊候第四》中亦云:“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21]元代医家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不治已病治未病》专论中指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22]

《本经》三品分类法中蕴含了治未病的细化方案。未病先防是治未病的首要原则,选择“上药……轻身益气不老延年”,是主张以预防为主,“摄养于无疾之先”,即在疾病未发生时就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从而防止或减少疾病发生,保持健康状态。用“中药……遏病补虚羸”,则是倡导在将病欲病之时即扼杀于萌芽,早期用药,补虚扶正兼祛邪,防止疾病进展、传变。用“下药……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即是要求针对病因病机,及时选择恰当的药物,疗疾防复从而使之痊愈,恢复健康。总而言之:健康则用上品未病先防,将病则用中品遏病防变,既病则用下品愈疾防复。

2.4 整体思维,体现传统文化的三才观

2.4.1 三才观

中国人重视事物间的互相联系。《本经》三品分类方法所提出的养生补虚愈疾的基本指导思想:“上药……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主治病,以应地。”明确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才观,即天、地、人同源于一气的整体思维,这一点与《黄帝内经》的思想如出一辙。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所言:“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11]¹¹⁰《素问·宝命全形论篇》亦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11]⁴²人禀天地之气而生,所以作为一个自然本体的存在,人与天地万物一样,具有同样的本原类质,正如程颢所说“天地人只一道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23]。这种天、地、人一体的三才观,是中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社会实践中,把天、地、人综合起来看作是构成宇宙系统的基本元素,并进一步揭示宇宙生发化育的自然规律,所形成的一种从整体上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思维方式。三才观所蕴含的从自然观念、生命观念到社会观念不断延伸的思维导向,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一以贯之。

一些考古资料证明三才观念至少在原始社会晚期就萌芽了。“三才”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9]³⁷¹目前所知的最早把天、地、人“三才”相联系的文献记录是《左传》^[24],《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周室贵族刘康公的言论说:“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25]⁴⁶²这里把“天地”与人(民)的“动作礼义威仪之则”联系起来,表现了天、地、人“三才”相通的思想。《周易·说卦传》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9]³⁷⁶“三才”之中都蕴含的阴阳之意,贯穿了天、地、人“三才”的始终,以实现彼此间的相互对应、相互联系。正如朱熹在《朱子大全·易纲领》中所说“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因于此,健康的本质内涵不只意味着完全无病,更应包含个人和其所处的环境之间处于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相对和谐关系。

2.4.2 《本经》中之三才观

基于这一思想,《本经》三品分类法提出:使用药性平和之无毒上药养命。所谓养“命”^[26],就是育养生命之“命”,侧重育养生命以使自己的生命达至和谐状态,目的是提升生命存在的质量和價值。需要掌握并顺应天地阴阳变化的规律,使生活符合养生之道,就能轻身不老、益寿延年。恰如《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所云:“提挈天地……和于阴阳……处天地之和……法则天地。”能“寿敝天地”“益其寿命而强”“可以百数”或“可使益寿而有极时”^[11]²。这点正应和了古人对上述《左传·成公十三年》周室贵族刘康公言论的注疏:“命虽受之天地,短长有本,顺理则寿考,逆理则夭折,是以有动作礼仪威仪之法,以定此命,言有法,则命之长短得定,无法,则夭折无恒也。”同理,用药性偏颇之有毒下药治病时,“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11]⁴³。

三品分类法中还指出“中药……,主养性以应人”。性者生也,古书中初无“性”字,生即是性,性即是生。《淮南子·俶真》说:“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5]³¹从这个意义上讲,“养性”即修心养性。古人早就意识到,人的健康不仅与天地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更受到社会环境的重要影响;不仅包括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及其在社会上的完全幸福的状态。所以《素问·疏五过论篇》中提到:“凡未诊病者,

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身体日减,气虚无精……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精华日脱,邪气乃并。”^{[1]158}《黄帝内经》及《本经》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古代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那些“尝贵后贱”“尝富后贫”等社会地位发生巨大变化者,或“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等心理变化起伏跌宕之人,其健康被各种“离绝菀结”的事件伤害,导致“精华日脱,邪气乃并”,于是“病从内生”。针对此类情况,《本经》在分类方法中给出了药物防治方案,即以“中药”“养性以应人”,从而“遏病补虚羸”。

综上,《本经》三品分类法基于“三才观”整体思维提出的健康观中,人不是独立的个体,其健康状况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影响,这其实是反映了一种高级的医学模式:自然-人-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而基于此提出的、用药物进行养生补虚愈疾的基本思想,无论是用“养命以应天”的上药、“养性以应人”的中药,还是用“治病以应地”的下药,都围绕着人的生命健康、身心健康,目的或是“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而“养命”,或“遏病补虚羸”而“养性”,或是“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而“治病”。这其实体现了一种极其深刻的生命内涵:在自然-人-社会的相互关联中,终极目的在于关注人的完整而全面的生命过程。

2.5 君臣佐使,彰显上医治国的战略观

《本经》这一分类方法还运用类比思维,彰显了上医治国的战略观。

2.5.1 整体思维,人本思想,构建和谐社会

《本经》三品分类中体现的三才观,基于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整体思维,其核心是希望人类认识自然,效法天地,顺应大道,养命修性,即要遵循天地的变化,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以此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周易·乾》中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9]4}“太者,极也。”“太和”即最高的和谐,就是指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和谐。另一个核心是三才中“人”为焦点,即“以人为本”的生命观,突出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尊重,强调的是人的中心位置和积极作用。

2.5.2 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复兴中华民族

《本经》三品分类中体现的“治未病”预防观,来源于中华民族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以及

防患于未然的预见意识和责任意识。《周易·系辞下》:“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9]359-360}《左传·襄公十一年》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25]554}《孟子·告子下》则明确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27]。这些理论和思想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承载着深厚的民族精神,才使得中华文明千年不断、长盛不衰。现在看来,治未病理念是养生保健之道,更可以作为促进国家进步、民族振兴的催化剂和动力源泉。

3 小结

通过上述剖析,我们更加深入认识到中国古代独特分类思维方式在医学中完整而深刻的展现,既包括事物或现象相似或相同的本质属性,更重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这一分类方法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生命观,蕴含了治未病的预防观,体现了基于整体思维的三才观,彰显了上医治国的战略观。这一方法,简单却不失高级,粗略但近乎系统,原始而臻于完备,其深刻的理论、细化的方案,影响深远。正因此,后世直到明以前的本草,虽然多采用自然属性分类的方法,但是仍与三品分类法结合进行,如《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品汇精要》等。直到清代,仍有一些本草著作,如《本草崇原》《本草经读》《本经疏证》等仍沿用三品分类。

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医药学术水平,对药物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深入,对部分药物的临床效用有失客观的判定,对药性的认识不够全面,《本经》的三品分类法的划分也有欠规范和严谨之处。因此《本经》之后至今,在观察、区分、使用中药的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为了便于认识、查考、检索、应用中药,中医药人反复实践、积累经验、加深认识,通过比较、鉴别、综合分析、同中求异、区类析族,不断改进药物的分类方法,使其更系统而切合实际。这一进程中的每种分类方法,都是在坚持中医药自身特色的基础上,不断汲取中华文明的宝贵成果,丰富并发展自己,真正做到了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参考文献:

- [1] 黄帝内经素问[M]. 傅景华,陈心智,点校.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
- [2] 荀子[M]. 杨倞,注. 耿芸标,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3] 吕云霞,周晨婷,汪鑫,等. 中药传统分类与命名文化的认知图式分析[J]. 江苏卫生事业管理, 2017, 28(6):95-97.
- [4] 吾淳. 中国思维形态[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5] 淮南子[M]. 高诱,注. 上海:上海书店, 2014.
- [6] 山海经[M]. 郭璞,注. 郝懿行,笺疏. 沈海波,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7] 芦净,赵建成,杨艳秋,等.《山海经·南山经》植物考[J]. 科学通报, 2013, 58(S1):66-70.
- [8] 朱有祥,李丽娇.《易经》逻辑思维试析[J]. 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47-50.
- [9] 周易[M]. 宋祚胤,注译. 长沙:岳麓书社, 2000.
- [10] 李致重. 从科学的出发点、含义、分类看中医(续)[J]. 湖北中医杂志, 2006, 28(2):3-5.
- [11] 陈宪涛,赵丹华. 类族辨物:汽车造型的视觉特征与语义特征分析[J]. 装饰, 2008(4):98-99.
- [12] 尔雅[M]. 郭璞,注. 王世伟,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125.
- [13] 神农本草经[M]. 森立之,重辑. 上海:群联出版社, 1955:15.
- [14] 王鹰. 中药临床分类客观化初步研究[D].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2.
- [15] 论语[M]. 程昌明,译注.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107.
- [16] 灵枢经校释[M]. 河北医学院,校释.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165.
-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67.
- [18]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 钟哲,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1998:442.
- [19] 黎翔凤. 管子校注[M]. 梁运华,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 2004:1507.
- [20] 诚虚子.《道德经》新解[M]. 济南:济南出版社, 2003:142.
- [21]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M]. 鲁兆麟,点校.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3.
- [22] 朱震亨. 丹溪心法[M]. 鲁兆麟,点校.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2.
- [23] 程颐,程颢. 二程集[M]. 北京:中华书局, 2004:15.
- [24] 陈高明. 和实生物:从“三才观”探视中国古代系统设计思想[D]. 天津:天津大学, 2011.
- [25] 赵生群. 春秋左传新注[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 [26] 兰辉耀.《庄子》内篇养“命”哲学论析[J]. 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5(2):6-11.
- [27] 朱熹. 孟子集注[M]. 济南:齐鲁书社, 1992:184.

(收稿日期:2022-01-21;网络首发日期:2022-06-23)